

在改革和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只能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来解决——

# 改革开放顺利推进的基本经验

章百家



##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专稿

关于改革开放的经验已有很多总结,最根本的一条是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党在长期社会主义建设中积累起深刻的经验教训,有经验丰富、眼光远大、富于智慧的领导集体,制定了正确的改革战略和评判改革措施成效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对此,人们已经说得很多,这里不必重复,重点谈五个方面的基本经验。

### 看准方向,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回顾起来,在上个世纪中我国改革开放有两段时间遇到的困难最为突出:第一段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第二段是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能够克服这两次困难,第一次是中央有坚定的改革开放决心;第二次是中央明确提出“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一心一意做好自己的事”。当然,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央有足够的智慧,应对得当。

### 有凝聚人心和共识的口号,有各方面相互配合的改革战略

“改革开放”“翻两番”和“小康”是最鼓

舞人心、令人印象深刻的口号。这三个口号不仅是概念,而且具有深刻内涵。“改革开放”提出了实现变革的路径,“翻两番”和“小康”提出了中期和长期的奋斗目标。我们党提出的“小康”标准,不仅指导我国制定现代化战略规划,也把国家的现代化目标与普通百姓的生活直接联系在一起,从而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在第一阶段很快形成了一套各方面相互配合的战略。其突出特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从经济体制入手;同时围绕加快经济发展的需要,形成政治、外交、军事、文化,以及按“一国两制”方针推动国家统一大业等各方面的战略配合。各方面战略能够协同一致的关键,在于我们党准确判断国际形势,妥善处理内政和外交的关系,坚持首先做好自己的事,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 改革采取渐进方式,以增量改革的方法实现由量变到质变

渐进式改革在经济体制方面最引人注目,但事实上各方面的改革都如此。例如,政治方面,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就以建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为过渡;对外开放,从特区开始,由沿海到沿江,再到内陆;其他如科技、

文教、医疗等方面的改革也是逐步推开。

渐进式改革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先后易后难,先清扫外围,最后攻坚;二是以点带面,先试点,再推开;三是以“双轨制”过渡,逐步完成新旧体制的交替。经济体制改革是渐进式改革的典型。考察这一过程,实际是在直接对计划体制进行改革困难重重的情况下,采取了体制外先行的策略,即通过为新兴经济体,包括个体企业、乡镇企业、大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等计划外企业,提供优先发展的条件,形成局部的市场经营,并不断将其做大,使之在全局中占据一定优势,然后再实行国企改革攻坚,以此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这种方法也被称为“增量改革”,其突出优点是极大地减少了改革的阻力和改革可能带来的社会震荡,有序实现从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转轨。

###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实现了中央、地方和基层的良性互动

在改革过程中,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一个突出的现象,也是一条重要的经验。例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的出现、经济特区的建立、股份制和证券市场的形成等,都是上、中、下层之间互动的结果。这种互动的突出特点是,中央的决策与各地、各部门和基层群众的首创精神前所未有地紧密结合在一起。没有中央坚定的决心和正确的决策,中、下层的首创精神难以发挥或将脱离正确轨道,而没有来自中、下层的首创精神和实践,中央难以形成坚定的决心和正确的决策,即使形成了也难以贯彻落实。还需特别指出,大量专家、学者的参与是促成这种互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作用是在上、中、下层之间传递信息,为中央和地方决策提供咨询,并参与各层次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实施。

### 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

从第一阶段的实践看,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是辩证的、动态的。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加快发展,而改革与发展又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同时,改革自身带有风险,改革与发展也势必会打破原有的平衡,产生不稳定因素;但是,如果把稳定置于首位,阻碍改革与发展,最终将会导致更大的不稳定。

从这个阶段的经验看,处理这三者关系的基本逻辑是,通过改革带动发展,当因改革和发展导致新的不稳定因素出现时,必须及时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措施加以消

除。例如,国企改革造成了大批职工下岗,为解决这一问题又促成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事实上,改革和发展带来的不稳定,主要是由于利益格局的变化。因此,处理好这三者关系的核心在于如何能使人民大众共享改革成果。在改革初期,人们对分享改革成果的关注主要在经济方面;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对改革成果的关注将不仅限于经济方面,还必然包括平等享有各方面的权利、实现社会的公平与公正等。

进入21世纪之后,我们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一阶段,中国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到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也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这时,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已不是改革开放之初所面对的那些老问题,而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新问题。这些问题或是新体制不完善、不健全所造成的,或是此前的改革涉及不多的,或是经济现代化“起飞”阶段过后才会出现的。

总的来看,40年来我国的一条基本经验是,在改革和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只能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来解决。成功应对挑战需要一个过程,我国的应对是积极的,并正在取得成效。

(作者为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 “新殖民主义论”背后的战略焦虑

——析关于“一带一路”的片面荒谬论调

王义桅



## 热点辨析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吸引了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其中,被写进联合国有关决议,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具吸引力的国际合作倡议。然而,“一带一路”毕竟是新生事物,中国提出如此宏大的国际合作倡议,也是历史头一遭,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媒体,仍有诸多不适应、不理解,当前各种片面荒谬的论调不时泛起,诸如“债务陷阱论”“中国模式输出论”“环境破坏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等。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非洲国家的建设,西方出现了“新殖民主义论”等攻击抹黑中非合作的论调,对此需要回应,并进行深入的辨析。

### 中国没有殖民的基因

1498年,达·伽马带领着他那只有三只旧帆船的船队去印度,途中绕过好望角登陆东非。当地的土著对他们夸耀说,他们曾经见过那种有着精美绣花帽檐的绿色丝绸帽。这些非洲土著嘲笑葡萄牙人送给他们的珠子、钟表、一串串的珊瑚、脸盆一点都不值钱,还有他们驾驶的小船,都没法给人留下什么深刻印象。村里的老人讲述了一段关于“白色幽灵”的传说:很久以前,有

一些穿着丝绸衣裳的人驶着大船来到他们的海岸边,然而没人知道这些人到过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他们从何而来,甚至有人怀疑这些人是不是真的来过。这些宝船已经消失在世界的记忆里……

早于西方航海家(海盗)们近一个世纪,郑和舰队就抵达东非,宝船比哥伦布最大的船高出数倍。然而,郑和是“我来了,我看见了,我离开了”,不同于西方憧憬“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殖民文化在西方一脉相承,而和平文化早已渗入中华民族基因。

也正因为中华民族有这样的文化基因,中国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开创了没有殖民扩张、战争掠夺而实现工业化的奇迹。

### “一带一路”倡议:助推非洲去殖民化

“一带一路”倡议完全不同于近代西方的殖民做法。“一带一路”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打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被西方殖民以来,非洲国家间的相互联系很少,都是与欧洲宗主国联系,两个接壤的非洲国家首都不能实现直航,而要绕道法国巴黎。非洲被殖民以后,逐渐成为西方国家资源和原材料的来源地。欧洲一体化并未带来宗主国在非洲殖民体系的一体化,非洲市场仍被西方殖民者分割。非洲内部贸易只占非洲各国对外贸易总额的

不到15%。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纠偏西方殖民体系下非洲国家与宗主国之间分割的纵向联系,加强非洲内部的横向联系。“一带一路”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入手,以点带线,以线带片,让非洲市场联通起来,从而帮助非洲获得内生发展动力,实现工业化,真正脱贫致富。

除了内部的互联互通外,“一带一路”还将给非洲带来两大效应:陆海联动、洲际联动。目前,全球八成的贸易往来要借助海洋,七成以上的GDP来自沿海地区一百公里地带。因此,近代由欧洲人开办的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海洋型全球化,广大内陆国家难以分享这种全球化的红利。五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哈萨克斯坦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意在扭转这种不平衡的经济全球化。

此外,中国“政府+市场”双轮驱动的模式也有助于改变非洲国家被边缘化的处境。一些在内陆的发展中国家,按市场经济规律很难获得国际金融机构贷款。但是中国的国有企业、银行可以提供开发性金融贷款,从改善其基础设施开始,逐步培育市场经济所需的环境。在这一过程中,只有中国能为非洲国家提供第一桶金,改变它们被全球化边缘化的命运。

### “新殖民主义论”背后的战略焦虑

近年来,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和营商模式,

备受西方舆论质疑,比如,有论调说中国只在意非洲的矿产资源和压榨当地廉价劳动力,而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和投资“不附带政治条件”,又助长了当地的专制和腐败政权,于是称中国人到非洲是“新殖民主义”。这是错误的。西方近年来对非洲的投资兴趣大减,只提供人道援助,西方舆论反过来指摘中国按照市场逻辑与非洲进行的贸易和对非洲的投资,除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理由外,这也反映出西方的战略焦虑。

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和西方的掠夺式投资有根本区别。中国对非洲的最大贡献是提供了不同的选择,这也是中国早年农村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遵循的逻辑,其核心是激发人的积极性,合理配置资源。从实际效果来看,中国的资金已经初步改变了非洲的命运,将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成功推向新的高度。

### 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中国永远是非洲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中非关系是南南关系,根本不同于西方与非洲的南北关系。如今,中非合作插上“一带一路”的翅膀,迎来黄金时代。把“一带一路”倡议同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非洲各国发展战略相互对接,开拓新的合作空间,发掘新的合作潜力,在传统优势领域深



耕厚植,在新经济领域加快培育亮点,根本目标在于打造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值得注意的是,在事实面前,西方舆论也开始出现认识上的转变。比如,日前发布的麦肯锡调研报告《龙狮共舞:中非经济合作现状如何,未来又将如何发展》坦言:欧盟和美国等西方捐助国主要以补助金形式提供援助,而中国则偏好基础设施建设优惠贷款和出口信用等形式。相比于附带苛刻政治条件的西方国家援助,中国的投资和援助不仅不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作梗,还按照市场规律,以发展经济的角度看待非洲。可以说,非洲在过去20年左右爆发式的发展从根本上得益于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和援助。

非洲虽进行了长期探索,但绝大部分国家仍未找到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面对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政的美国,非洲国家对西方模式深感失望,纷纷向东看。从发展援助到学习中国自主发展经验,进而搞招商引资、改革开放,非洲国家越来越重视学习中国经验,把中国资金、技术、市场、企业、人才和成功发展经验等相对发展优势同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巨大的人口红利和市场潜力紧密结合起来,必将创造出新的发展奇迹。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

在当前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城郊农民对“农转非”产生抵触情绪——

# “户籍依恋”为哪般

于莉



## 调查思考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城郊农民的市民化成为必然趋势,而市民化的一个标志性转变就是户籍身份由农业转为非农业。然而事实上,大量城郊农民并不期望市民化,甚至对户籍身份的“农转非”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在失去土地之后,城郊农民表现出对农业户籍身份的强烈依恋,这种户籍依恋阻碍了其市民化的进程。因而,有必要探讨城郊农民户籍依恋背后的原因,以促进城郊农民顺利完成由农民到新市民的转型。

### 农民的土地依恋与安全伦理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土地是农民生命、生活的一部分,是农民世代代生存繁衍的依靠。由于与农民的生活紧密关联,土地还常常承载着农民人生的希望和精神的寄托,它造就了农民对土地难以割舍的情怀。



本版供图:石全

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几亿农民离开土地,从事各行各业,在职业、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都发生了分化。随着“离土创业”带给农民收入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农民对土地的依恋也逐渐消减。虽然土地已经不是他们赖以谋生的唯一出路,但多数农民并不愿意脱离土地,他们没有因为谋生手段的变化和收入的提高而想要放弃土地的经营权。

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学界对农民经济行为的研究提出了“道义经济”和“理性小农”的观点。以普波金为代表的“理性小农”观点认为,农民的行为逻辑是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以斯科特为代表的“道义经济”理论认为,农民的行为选择遵循“安全第一”和“生存伦理”的准则。农民经常把生存安全置于行为选择的首位,因此,在提高收入和回避风险的选择中,会优先选择回避风险。由此产生了农民的安全伦理,如果触犯了农民的生存安全底线,就会被农民视为不道德、不公正,而招致农民的反叛。

很多研究者认为,当前我国农民不肯放弃地权的土地依恋源自于满足安全保障的“生存伦理”,而非追求最大化收益的经济理性,农民对失地的抵制情绪来自于安全感的缺失。在城乡二元体制下,我国农民不能享受市民待遇和保障,土地成为农民自我保障的重要基础。对于大多外出务工的农民来说,土地所能提供的仅仅是最低层次的生活需求,但土地具有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的保障功能,是农民生活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农民不愿意失去土地,主要是因为对农民来说失去土地就失去了基本生活保障,其生存安全将面临重大威胁。

### 城郊农民的生存风险与“户籍依恋”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城郊农民由于征地拆迁而离开土地,面临户籍身份“农转非”的市民化选择。在对农民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探讨中,研究者发现由于城郊农民担心转变为市民后会失去土地资源保障而遭遇生计风险,所以不敢轻易放弃农民身份。此外,城郊农民的素质技能较低,工作选择空间小,就业不稳定,收入不高,成为阻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首要因素。同时,城郊农民无法享有城市社会保障,难以具备融入城市生活的资源,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郊农民市民化的意愿。

在经历征地拆迁之后,大部分城郊农民的生活保障主要来自于征地拆迁补偿和集体经济保障。很多村集体在征地后还保留部分留用地并以此发展集体经济,这被一些研究者视为解决失地农民保障问题的良方。由集体经济承担为失地农民供给社会福利和就业救助的责任,有效地弥补了政府的供给不足,使城郊农民能够享受到村级层面涉及住房、养老、教育、就业等多方面的社会福利和保障支持,而且集体经济的保障还为城郊农民提供了生存和心理的安全性保证。

获得集体保障的前提是城郊农民拥有村集体成员身份,而能够证明其身份的依据就是拥有农业户籍身份,如果失去农业户籍,即使能够证明其村籍身份,也会因为没有农业户籍而减少村集体福利水平。在失去土地保障之后,城郊农民的生活安全脆弱性水平较高,集体保障成为替代土地保障使城郊农民获得生活安全感的最后依靠。在无法保留土地使用权的情况下,保留农业户

籍成为城郊农民安全伦理的最后需求。

### 大部分城郊农民不愿意“农转非”的首要原因

从目前看,城郊农民对“农转非”意愿的选择首先考虑的是福利政策因素,这正是其寻求生活安全的首要伦理要求。大部分城郊农民对“农转非”后获得城市福利保障信心不足,而基于农业户籍的农村集体保障给农民带来更大的生活安全感,这也是大部分城郊农民不愿意“农转非”的首要原因。

此外,农业户籍身份还可以给城郊农民带来直接的经济收益,这通常与城郊农民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及其所属村队的集体资产经营相关联,是农业户籍特有的利益关联。很多集体经济发展迅速的地区,集体分红成为农民的重要收入来源。同时,集体分配的住房不仅满足了城郊农民的居住需求,还能为其带来租金收益。相对于城市商品房高不可及的房价,城郊农民获得的集体住房能够保障几代人居住无忧,还可以获得租金收益,这对城郊农民的生存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中心城区向外扩张,城郊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然而,大多数城郊农民并不向往中心城区更高的生活品质,在市民化问题上也很少考虑“农转非”在升学、就业、发展空间等方面可能带来的收益。这进一步说明大多数城郊农民首要关注的还是生存问题而非发展问题。可见,农民市民化意愿与其生活安全性具有直接关联,由于可能面临生存风险,而又不具备抵御风险的外部支持和内在能力,直接影响农民的市民化意愿选择,保持农业户籍身份正是城郊农民追求生活安全性的结果。(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 学术会议传真

### 将改革开放经验上升到理论层面

近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京津冀党校学习观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术研讨会在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召开。与会专家围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历史成就、思想基础、动力机制、基本经验、能量红利等主题展开研讨。

与会专家认为,解放思想 and 理论创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逻辑和基本经验,并贯穿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一部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一部解放思想的历史;不断地进行经验总结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将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总结好,上升到理论层面,有利于进一步深化改革。(袁昕)

### 科学判定时代方位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第九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在京举行,论坛主题为“世界格局、‘一带一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会专家围绕“一带一路”倡议与新的经济全球化,国际金融垄断、世界格局变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等三大议题进行深入探讨,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指明了方向。

与会专家指出,改革开放是一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社会革命,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新的飞跃;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恩格斯所指明的大的历史时代,同时也处于列宁所说的金融帝国主义这一特定的小的历史时代,科学判定时代方位将使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充满信心。(张悦)